



思考活动的伦理意义 ——阿伦特对“平庸之恶”的破解

徐 亮

摘 要: 汉娜·阿伦特认为,现代社会中个人的盲目服从行为是导致极权主义兴起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对艾希曼案例的剖析中,阿伦特发现,其无意识的服从行为主要是由于不思(thoughtlessness)所导致的,这种不思是现代社会人们缺乏对自己意识、行为判断的主要原因。思考活动是反抗式的,是对一切人们业已认为理所当然的规则或规范的审查、反思、批判甚至瓦解。在这方面,阿伦特最为重大的贡献在于她向我们呈现了她的思考过程,并有可能激起更多人的思考,这正是克服现代社会病症的必要方式。

关键词: 思考活动;平庸之恶;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艾希曼案

中图分类号: B82-0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17)04-0087-07

汉娜·阿伦特一生都在思考:为什么极权主义会出现于现代社会,为什么完美的魏玛宪法会催生自由民主政制的敌人,现代政治社会出了什么问题?与《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整体的、宏观的思考角度不同,阿伦特的中晚期作品都倾向于从个体精神官能层面寻找破解现代政治病症之良方。艾希曼的审判让晚年阿伦特意识到,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盲从的个人为极权主义提供了滋长的温床,他们丧失了思考的自觉,继而丧失了对自我意识与行为责任的判断,成为恶的无意识服从者。

只有理解了艾希曼案对阿伦特的刺激,才能理解她为何由积极生活(vita activa)的行动哲学转向精神生活。阿伦特发现,作为犹太人运输官的艾希曼,对其行为的意义和责任表现出令人吃惊的无知,试图在机械的执行者艾希曼身上寻求深层次的原因或内在动机是不可能的。对于平庸之恶,阿伦特写道,“我模糊地意识到,艾希曼的罪恶行为,与我们传统思想中关于罪恶的理由相去甚远”,造成平庸之恶的并非愚蠢,而是无思(thoughtlessness)^①。因此,阿伦特对思考活动的关注并非解决政治问题无能后转向了哲学,弄清楚阿伦特为何要回到哲学以及她关于思考活动思想的一致性,就能清楚阿伦特从行动到思考仍是对著作《人类境况》中未竟的政治哲学的继续,“‘拯救行动’与‘拯救思’是同一件事情的两面,无论从哲学思想的一致性还是彻底性来说,她的晚年著作《精神生活》都是其政治哲学思想的重要补充”^②。

一、对现代道德哲学的批判

现代规范道德哲学要求人们服从普遍的道德规范,而忽略人们对具体的日常生活经验或事实的思考,从而取消了反思道德规则对错的可能性。当纳粹政权用一套新的价值

① ARENDT H. The Life of the Mind. Harcourt, 1978: 4.

② 王音力. 阿伦特论思的政治意义.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 35(6): 29.

体系取代旧的价值体系,那些追随纳粹统治的普通人也就轻易地更改了自己的道德标准,而无须审慎地思考或判断。因此,德国社会的普通个体能与纳粹政权自然地合作,每个人从相信战前的价值体系到转向相信纳粹的价值体系,再到二战后尊奉战后价值体系,这中间都是如此地轻率随意。在阿伦特看来,这才是德国社会真正需要反思的政治伦理问题。

阿伦特首先将矛头指向完备而系统的规范道德学说,认为这些理论对人们思考具体的生活处境毫无裨益,她利用纳粹事实对规则式的道德哲学展开批判。一直以来,哲学家们都试图建立关于是非对错的规范性、完备性道德学说,然而艾希曼的无意识之恶表明,现代社会的善恶问题竟与道德规则毫无关系,“这些道德问题来源于实际经验,而不是伦理学所提供的‘恶’的见解与观点”^①。那些由思想家们辛苦建立的关于善恶、是非对错的标准并不能为人们实际经验或事务的认知、判断提供帮助,理论与经验之间存在明显分裂。艾希曼现象则展现了这一危机,他丝毫不为自己的行为内疚,甚至认为他是在按照康德的道德哲学行事。艾希曼显然误解了康德学说,但这并非问题的关键,重点在于:他的思考从未与自己的实际经验、处境发生联系。理论与经验脱节的状况表明,以康德为首的现代道德哲学,在建构了诸多或深刻或晦涩的道德规范的同时,忽略了个人的感受、认知、理解、思考和判断。人们依某种规则而行动,比如在一套严密繁杂的官僚体制中恪尽职守,却不去思考在具体境况中执行规范的有效性、合理性以及执行者自身的感受、意见和倾向。可能的结果是:兢兢业业按照道德规范行事的人,却有可能在浑然不觉中积极从事着助纣为虐的勾当。

在高度理性的现代社会中,人们反而逐渐丧失了对自己具体处境和生活经验的考察与反思,其原因何在?阿伦特将矛头指向了思考活动本身,认为现代社会的人们分别从思考的目标、对象和形式上误解了思考活动。艾希曼自以为具有思考与判断能力,阿伦特则指出艾希曼自认为的思考活动中根本没有个人意志,他只是思考自己是否服从了元首的意志或法律规则,缺乏个人理解判断的思考不能称之为真正的思考。根据阿伦特的观点,人们对自己生活意义的思考和判断不能依据某种道德学说,也不是根据社会习俗或元首意志或法律,而是从具体处境展开。在对习俗的否定中,阿伦特援引了二战后德国价值重建的经历,“我们——至少我们中间那些年长些的人们——已见证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公共和私人生活中所有既定道德准则的全面崩溃”^②。德国两次道德价值崩溃的经历意味着,现代社会关于道德价值建构的出发点出了问题。

现代道德哲学以一种全面而系统的道德学说呈现在人们面前。在阿伦特看来,完备性的道德学具有专制性、强迫性。唯一正确的道德学说取消了人们反思的可能性、必要性和差异性,它只是让人们服从,而不是去思考,“只要道德标准被社会普遍接受,这些普通人就绝不会想到要对他们被教导去信仰的东西表示怀疑”^③。道德坚信者们失去了怀疑和审视的能力,他们只会盲目地接受普遍性道德,丝毫不会反思为什么要信守这样的道德,而思考活动的本质正是一种怀疑。

规范的道德学说是不可靠的,这一点在纳粹统治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纳粹确实宣布了一套新价值,并据此设立法律体系。它也证明了,能够迅速忘记或顺应与其地位相适应的道德信念的人,不必是一名坚定的纳粹”^④。从一般意义上来说,人们改变对某种道德学说的信任或价值偏好,不仅是一种理性上的选择,也需要信念或情感作为基础。在德国纳粹统治时期道德价值观的变化中,理性远在个人的情感、倾向之上,人们理性地服从这些具有普遍性的道德学说,没有内心的挣扎,也不需要信念、情感作为基础。人们总是对既有的价值体系全盘接受或彻底改变,“道德确实如一套习俗,如餐桌礼仪那样被轻易地被换掉”^⑤。阿伦特对真理和规范道德哲学的批判,实际是批判以规则为中心的现代道德学说,

① ARENDT H. The Life of the Mind. Harcourt, 1978: 6.

② 阿伦特. 责任与判断. 陈联营,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42.

③ 阿伦特. 责任与判断. 陈联营,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43.

④ 阿伦特. 责任与判断. 陈联营,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42-43.

⑤ 阿伦特. 责任与判断. 陈联营,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40.

“现代道德是以‘义务’为基础的,或者说以‘规则’为中心的”,以规则为中心的现代道德学说远离了道德的根源,背离了道德的本质^①。

德国的战后重建并未反思纳粹兴起与道德哲学之间的关系,也未反思道德价值轻易被更替的深层原因。当道德体系如此轻易地被翻转或替换,可见道德价值与事实、理论与实践、理性与情感的分裂。阿伦特认为,人们不假思索地转而信任另一种新的价值体系,甚至不问是非对错及缘由,是因为我们中间的罪犯没有得到惩罚,他们并未从这些生活经历中有所反思与进步。对规范道德学说的不思或不检审,显然是现代社会的普遍病症,工具理性教人们服从而不是反思,如要重启人们对思考的重视,首先是要重新恢复思考活动的原貌。

二、为思考活动正名

在对传统思考活动的考察中,阿伦特批判哲学传统过于追求形而上学和真理,这使得思考活动沉迷于追求永恒和不朽,而忽略了具体的多样化的人类政治事务。按照阿伦特的观点,现代人们对思考活动的误解,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传统关于沉思生活与行动生活的二分,其对立的划分直接导致了思考活动与实践活动的对立。传统沉思活动目标和对象的错置,导致了思考活动的狭隘,也带来了人类政治事务的虚空与脆弱,这是哲学对政治犯下的过错。人们对思考活动的误读主要体现在思考活动的对象、性质和目标三个层次上。

首先,人们对思考活动的误解是传统沉思活动所带来的。阿伦特认为,真理或普遍性的道德学说所具有的唯一正确性容易取消思考的必要性,真理或普遍性道德学说具有专制的性质,而思考活动和行动生活一样,本应是复数性的个人展示其多样性的活动。阿伦特对思考活动的阐述与她对行动生活的阐述如出一辙,即认为两者都是展现人的复数性、多样性、差异性的活动,思和行动一样揭示了世界的多样性,每一次的揭示都是一个全新的开始,一个新的意义的切入。在阿伦特看来,思考活动正是差异化的个人不同意识活动(理解、思考、判断)的体现,思考活动使得人们对共同生活世界的理解丰富多彩,因此,揭示被形而上学歪曲的思考活动的真相本身就具有政治意义。

其次,思考活动对象的变化使得人们不再关心思考活动。思考的对象和目标是什么,或者说是什么在激起人们的思考活动?考察思考活动的历史必须回到思考的诉求上。阿伦特认为,柏拉图以来的哲学沉思传统过于注重追求真理,同时将其限定在职业思想家的范围内,这使得思考活动成为少数人的专有职业,而不是每个人的权利。思考活动追求真理或知识,这与理解人们日常生活事务并无直接关联,因此思考活动不能刺激人们关注自己周遭世界的意义,这便是阿伦特所说的人类事务脆弱的重要原因,即每个人不再从自身出发思考人类事务的意义。传统沉思生活认为思考源于惊诧。阿伦特认为,惊诧并不是要知道事物本来的面目或知识,对共同体中的人们而言,惊诧是出于自身理解周遭世界的冲动,是源于对公共事务意义的关注,思考活动是面向他们共享的世界与事务。

再次,思考活动在现代社会的衰落还与现代哲学、自然科学的兴起不无关联,这两者破坏了思考活动的确定性。阿伦特在代表作《人类境况》的最后论及现代世界的转变:一方面,笛卡尔的怀疑使得思考活动从传统形而上学(如真理、知识或外在世界真相的追求)转向了内省式的、更为主观主义的哲学;另一方面,由感觉—知觉确定性(内省性的)发展起来的现代自然科学进一步动摇了思考活动的确定性。因此,思考活动从关注形而上学转向了实证主义,思考在哲学层面转向主观化。理性在现代性进程中获得极大发展,这加强了人们对认识自然界本质的自负;同时,人们也开始用理性构建各种规范道德理论,并以此来干预实践导向的人类事务。理性的自负导致了其运用范围的越界,现代道德哲学正是建立在对理性的自负和普遍性假设的基础上,人们带着理性思考结果可普遍化的导向来理解和指导多样化的人类事务,这是思考活动的另一重错置。

^①徐向东.道德哲学与实践理性.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4.

最后,现代社会人们不思考是思考活动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思考活动之所以在现代社会中被取消,是因为思考活动本身是反抗式的。反抗式的思考活动对既有的价值体系有着瓦解作用,思考活动自然被政治生活中的掌权者们认为不必要,判断的能力和意愿到处都遭到了围攻,即便是在自由民主国家。思考活动的缺乏与现代社会的特质也有着密切的关系,思考活动与公共性密切关联,“现代世界的‘公共性’逐渐消失,有思考能力的个人已不再存在”,杨布鲁厄在对阿伦特精神生活三部曲的评价中认为,不再思考的个体假设与现代社会对公共性的取消不无关联^①。

阿伦特试图恢复被政治生活所遮蔽的公民能力,她希望能够重新激起人们思考的必要性和积极性。思考活动意味着人们能自己理解政治生活,认识自己所处的公共生活中的危机与机遇,“这样的思考活动,即对于那些发生于周围的事件,无论其内容和结果是什么,进行审查和反思的习惯”^②。由此看出,思考不是为了知识或真理,更重要的功能是以自己的方式理解人类政治事务。阿伦特希望将思考从探寻真理、认知世界的功能上重新拉回到思考人类事务本身,“整个思想史,对思想结果反映的太多,而对思考的过程记录则太少”,思考在本质上是无结果的^③。阿伦特对思考活动的批判和正名,正是为了恢复被传统哲学、现代道德哲学或科学等所遮蔽的“政治之思”,阿伦特批判了以上所有理性的、主观的、纯粹经验层面的思,她试图让人们回到思考活动本身。

三、思考活动的内涵

恢复人类的思考活动与阻止平庸的恶之间是否有关联,阿伦特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而是通过回答“什么是思考活动的内涵”来侧面回答。思考能力是每个人必须具备的,“如果这个联系(思考能力与恶之间)确实存在,那么区别于知识渴求的思考能力,必须被赋予每一个人,它不能是少数人的专利”^④。与其说道德观念或价值是真理,不如说是人们在不断变化的人类事务中通过对经验的理解与反思渐趋认识到的,善恶的回答没有标准或终极答案。阿伦特反对康德将思考结果作为公理的观点,如果有公理就意味着“不能对新的关于善恶的最终定义怀有期望”,道德观念是在每个人的思考过程中呈现出来的,它不是某个哲学家思考的结果^⑤。

阿伦特首先从思考活动的时空观入手讨论思考活动内涵,即思考的时候我们在哪里,她从三个方面解析了这一问题的^⑥。第一,思考时我们要撇开所有的同伴,撇开同伴意味着思考时的我离开他者而转向自身,思维时我们是以本体而存在的。第二,阿伦特承认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沉思生活是局外人的生活,思考者是无家之人,思考时候的我可以跳出自我立场从而考虑他者,或对过去的事物进行游历。第三,思考活动处理的是不在场之物,思考对象是那些业已消逝、正在进行或即将进行的人类事务的意义,而不是那些正在呈现的表象。因此,思考活动是在共同的世界中思考共同的事务,思考活动的主体和对象都在人类具体的公共生活中。由此可见,阿伦特对思考活动的探讨不是要回到纯粹沉思生活,而是对人类事务进行政治的思考。

在阿伦特看来,“思考时我们在哪里”提问的方式都是错误的,这样提问会使思考活动被限定在空间(地方或位置),而忽略了时间轴。从空间而言,思考时我们无处不在,我们又不在任何地方,思考意味着“去感性化,而且使他们非空间化”;从时间而言,阿伦特引用康德的话来论证,“时间仅是内在意识的形式,除此以外什么都不是”,即可以超越当下^⑦。阿伦特对思考活动的空间、时间概念的引入,使得思考活动超越了主体、超越了时空,同时具有了历史哲学的韵味,思考活动是面向过去、现在与未来的人类事

① YOUNG-BRUEHL E. Reflection on Hannah Arendt's Life of Mind. Political Theory, 1982, 10(2): 277-305.

② 阿伦特. 责任与判断. 陈联营,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131.

③ 阿伦特. 责任与判断. 陈联营,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136.

④ 阿伦特. 责任与判断. 陈联营,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136.

⑤ 阿伦特. 责任与判断. 陈联营,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136.

⑥ ARENDT H. The Life of the Mind. One/Thinking. New York: Harcourt, 1978: 197-199.

⑦ ARENDT H. The Life of the Mind. One/Thinking. New York: Harcourt, 1978: 201.

务。阿伦特接受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观念,认为只有思考时我们才存在,思考活动是每个人存在的形式。思考活动呈现不可见或过去事物的诸多表象,这些表象激发人们的思考,又成为思考的对象^①。

呈现思考的过程,是每个人在公共生活中显现自己的方式。思考活动转向自身意味着每个人据自己的理解能力,认识经验性的人类事务,并呈现出多样化的理解和观点。思考活动使主体呈现在公共生活中,思考之物意见与行动一样,是每个人在公共生活中呈现自己的方式。对人类事务的思考活动不是为了认知,阿伦特认为,“作为人生的一种自然需要和意识中的差异的具体化,它不是少数人的特权,而是每一个人永远可以运用的能力”^②。阿伦特试图恢复思考活动是每个人权利的本质,每个人要对自己周遭的世界有自己独特的理解、思考和意见,思考活动甚至是先于行动的人类活动。关注思考结果恰是对思考活动的误解,思考的本质是不可见的,思考活动处理的是不可见之物,思考活动本身也是不可见的,思考活动本身没有明确的目的性和方向性。阿伦特对思考活动的定位与行动一样,具有浓厚的现象学色彩:思考不在于结果和答案,而在于追问本身,思考过程比思考结果更为重要。思考活动是无凭栏式的,思考活动没有目的性。如果一定要有所凭依,那就是思考活动的目标是追求人类事务的意义,乃至追求生活的意义(meaning)^③。“这种思考活动,不是为了冥想,是为了追求意义……保存和判断不是使过去正当化,而是弄清楚过去的意义。”^④

思考还是反抗式的,是对一切人们业已认为理所当然的价值、规则和规范的审查、反思甚至瓦解。思考活动面向人类事务本身,面向具体的问题与处境,这就使得思考不是依据既有的习俗、法律或者规则来进行。思考活动具有苏格拉底诘问的影子,阿伦特认为苏格拉底式的诘问就是政治性的,因为苏格拉底帮助人们发现了自己内心的真正想法。所谓“政治地思考”就是多样化的思考方式,每个人都发现了自己的想法,从而不盲从遵守或服从某一习俗、法律或道德。阿伦特认为苏格拉底与城邦公民的谈话是政治性思考的典范,苏格拉底的诘问帮助人们发现自己对人类事务的意见、观点,激发人们对是非对错标准的思考,而不是简单地将他自己所认为的真理或价值施加于人,或从经验中直接传递给人们一整套习俗、法律或准则,这种思考活动就是公共政治生活中思考的典范。

对于“如何思考”,阿伦特没有给出具体的方案,诚如实践没有准则就难以进行一样,思考活动没有准则与凭依也显得颇为困难。这使得阿伦特思考活动的概念乃至其思考方法颇受争议,例如本哈伯指出的阿伦特思想中存在的哲学困境以及在普遍与特殊之间存在的紧张关系^⑤。根据阿伦特的观点,人们的思考活动无所凭依,如果有,那应该是人们生活共同体中的共通感。但阿伦特并未对共通感、共识等诸多概念成功地进行回答,思考活动的实践规则晦暗不明。阿伦特所强调的思考活动,也正如她自己的思考方式一样,批判有余而建构不足。

四、思考活动的伦理意义

阿伦特通过破除现代世界对思的误解来厘清思考活动的本质,她批判人们业已接受的思考结果——道德规范,强调思考活动的过程性质,主张人们根据自己对经验的感受、认知来理解、思考和判断实践生活的意义与价值。“思考活动不可避免地对所有已树立的尺度、价值和善恶标准,简单地说,即对我们在道德和伦理中处理的习俗与行为准则,有一种破坏性的效果。”^⑥思考能力具有一种破坏或者瓦解的作用,思考活动会“无情地消解并重新审查已被接受的所有教条和规则的意义追寻活动,时刻都可以转而反对自身,就仿佛它产生了一个旧价值的翻转,并宣布它们为‘新价值’”^⑦。思考活动使每个人

① ARENDT H. The Life of the Mind. One/Thinking. New York: Harcourt, 1978: 201.

② 阿伦特. 责任与判断. 陈联营,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152.

③ ARENDT H. The Life of the Mind. One/Thinking. New York: Harcourt, 1978: 58.

④ ARENDT H. The Life of the Mind. One/Thinking. New York: Harcourt, 1978: 57.

⑤ BENHABID S. Judgment and the Moral Foundations of Politics in Arendt's Thought.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2.

⑥ 阿伦特. 责任与判断. 陈联营,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143.

⑦ 阿伦特. 责任与判断. 陈联营,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144.

都不盲目地相信某一套价值体系,而是通过自己的思考和辨别,发现诸道德价值的现实意义并做出选择。思考能力对现代政治社会中的人而言,又可以称为公民的德性或能力。

思考在什么程度上能够扩展到政治领域中,对于这一问题阿伦特最终将解决之道放在了审美判断这一康德式命题上,只有判断,最后才能将思考活动的政治功能,带到人们的面前。思考活动的瓦解作用对人类的另一种能力,即判断能力有一种解放的效果,在判断活动中思考的功能才进一步显现出来。现代道德哲学注重普遍道德规则的建构,这导致人们对具体事务的是非判断往往不是面向具体之物而是根据普遍的道德规则。在阿伦特看来,只有当思考面对人类事务本身而不是轻率地据以某种普遍规则作出判断,人们所具有的道德标准才能够具有新的、可靠的价值源泉。阿伦特式的思考活动是瓦解式的,是推翻旧价值,而判断力则可以发现和构建新价值。传统的思考活动是根据真理或某种普遍规则来进行,这使人们容易忽略具体的、特殊的实际情况及自己对经验的认知与感受,阿伦特则注重每个个体对具体人类事务辨别是非的能力。

阿伦特提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她又持非情境主义式的伦理观点,她排斥哲学式的真理、规范道德哲学等理论性较强的价值路径,但她更看重公民个体对政治生活的理解、认知、思考、判断。阿伦特认为每个人的价值应该来自个体独特的经验感受及反思,而不是源于某种普遍的完备的道德学说,因此可以说阿伦特持一种基础主义的伦理观^①。个体的是非辨别能力主要源于人们日常生活的经验性的活动而非理论理性,它源于更为基础性的感受与认知。阿伦特所认为的思考活动是对人类事务活动作伦理性反思,人们在日常生活的是非观念来源,既不完全来源于习俗也不完全来源于理性,阿伦特保持了对理性与经验的双重警惕。显然,阿伦特对理论与经验的双重警惕与批判也带来了理论建构的困难,同时阿伦特主张价值的基础主义与个体主义,也容易滑向主观主义的深渊。

阿伦特认为政治伦理应强调伦理价值的经验特质,她看重实践智慧而非理论智慧,更不同于现代式的工具理性。阿伦特显然受到亚里士多德关于伦理智慧论述的影响,然而阿伦特的观点与亚里士多德又大有不同。现代世界的生活经验让阿伦特警惕习俗、警惕理论理性,且更为警惕以共同体价值为名的共同善。阿伦特担心共同体以共善的名义而牺牲个人的善,她只接受统一的道德价值对共和政体的建构作用,但不认同其对个人道德生活的指导作用。与共和主义所青睐的词语共同善、共同理念、公意相比,阿伦特更加信任那些基础性的感觉与价值,例如共通感、常识。

阿伦特并不像人们所认为的古典共和主义者,倡导共同善或希望回到希腊政治中去,恰恰相反,阿伦特是一位对现代政治中自由主义价值有着认同的政治思想家,即禁止国家干预个人自由。国家的作用只限于保护个人就不同的好的生活观的价值进行思考和判断的能力,而不能替代个人选择,更不能制定统一的生活价值观。阿伦特早期所强调的公民理性,与罗尔斯的公共理性观点更为接近,人们基于公民理性达到的某种社会共识,是指公民的政治观、价值观的重合部分(最大公约数),是公共生活中的重叠共识。阿伦特的政治伦理思想具有很强的基础主义色彩,强调个体的理解、思考能力,强调人们呈现自我、交往交流意见的能力,其政治价值的共识是在交互性中逐渐形成的。

共同体中的个人仅有公民理性、公共理性是不够的,公民个体之间需要共同的情感基础。在阿伦特看来,构成共同情感的是共同体的历史、传统、共同经验与记忆等,是共同体的成员之间相互联结的桥梁和纽带,而不是共同善。现代政治事务的伦理基础探寻注重公共理性的路径,阿伦特则提出理性与经验的双重导向,她看重历史、传统、文化、共通感、常识等系列概念。普通个体就自己的生活经验、感受、认知形成意见,并在不同的个体之间重新寻找、联结,并形成社群、社会,再达成共同意见、建构公共世界。在寻找与他者成为共同体的过程中,每个人都参与进来,都有自己的思考和行动,个体才成为共同体的实质性成员。共同体的价值体系或共善是基于每个人都展现自己多样化存在、思考过程,并在沟通、交

① WEYANDT S. Between Foundationalism and Subjectivism: Hannah Arendt and the Recovery of Ethical Standards. Loyola University Chicago, 2007.

流中不断妥协或坚持中达成新的共识,这就是人们生活中的共同价值、伦理或道德,即承认自我与共同体关系的过程。

五、结 语

阿伦特思考活动的思想渊源是复杂的,其思想的痕迹具有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等多人的痕迹。在抗恶问题上,对理性充满警惕的阿伦特没有走上类似于罗尔斯的公共理性概念,或雅斯贝尔斯的交往基础上的普遍性,或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最后是诉诸审美与良知。德国纳粹的掌权使阿伦特认识到工具理性的局限:当人们忽略了自身对真实世界的经历、感受和良知,才会盲目地、理性地服从。

在笔者看来,阿伦特最重要的贡献不在于她反思了现代社会思考活动衰落的原因,不在于她重新确立了思考活动对象——人类事务,不在于她重新诠释了思考活动的内涵,而在于她向我们呈现了她的思考过程。阿伦特开放式的思想、不受限制的批判、解构式的研究,都启迪了无数人对现代生活处境的思考。阿伦特并未提供一种完备性的思想体系、学说或真理,而是典范式地呈现了她思考活动的全过程,并展示了她所认为的思考活动的内涵:每个人都关心自己真实生活的境况,思考人类事务的意义并发表观点意见,再通过沟通、协商等方式达成新的价值共识或共通感。

每个人通过思考活动跳出当下,游历于人类事务中,在思考活动中思考者既身处当下的具体事务,又能通过想象力让思想游历得更远。在思考的时候,我们可以疏离现在,以一种游历的视野及姿态来审视当下,以此来弥合过去与未来的鸿沟。因此,思考是对具体生活经验的思索而非离开人类事务,思考是从具体的、特殊的经验出发又不沉溺于当下。思考活动是公共生活中的每个个体对周遭世界的关注、认识、理解及形成意见并呈现观点的过程,是和共享的世界建立关联的过程,是处在政治社会中的人们重新形成关于人类事务的价值、观念和道德的基础性活动。

The Ethical Meaning of Thinking:
ARENDT’s Solution for “the Banality of Evil”

XU Liang (Sun Yat-Sen University)

Abstract: Hannah Arendt recognizes that the blind obedience of individuals in modern society w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auses of totalitarianism. In her analysis of the case of Adolf Eichmann, Arendt thinks that his unconscious obedience followed from his “thoughtlessness” which primarily accounts for modern people’s lack of judgments of their own consciousness and action. Thinking is resistant in that it rethinks the rules or norms which people have taken for granted. Arendt’s most important contribution on this issue lies in her presenting her thinking process which can probably prompt more people’s thinking as a necessary remedy for the condition of modern society.

Key words: thinking; the banality of evil; Hannah Arendt; totalitarianism; the case of Adolf Eichmann

- 收稿日期:2016-04-09
- 作者地址:徐 亮,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广州 510275
-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16wkpy21)
- 责任编辑:桂 莉